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文学制度改革 与中国新时期 文学

吴义勤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学制度变革的背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

演进轨迹与价值观反思

当代文学制度的内在属性、历史变革和改

革趋向

作家身份危机制度变革与文学新变

文学评奖机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

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

当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期刊出版制度研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场

文学传媒与当代文学生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

网络时代：「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与「文

014005113

I206.7
263

文学制度改革 与中国新时期 文学

吴义勤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北航

C1692287

I206.7
2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吴义勤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039 - 5695 - 9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3481 号

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主 编 吴义勤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695 - 9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前言

文学制度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某种意义上，文学机构、文学运动、作家身份、文学机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制度”性的内涵确实构成了中国文学生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制度”层面的切入无疑给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了崭新的领域，推进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方面，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等著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文学的制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20 世纪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制度研究还需要平衡，尤其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制度改度之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关系的研究学界还关注不够。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却是急迫而不容回避的，因为随着中国新时期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学体制的改革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如何进行文学体制改革？如何通过体制改革促进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更大繁荣与发展？这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来说无疑都是战略性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文学制度和作家制度，作家身份、文学地位均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这种制度既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局限性。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文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完善的作家组织机构、管理体制，有国家所有制的出版社和文学期刊社，有专业作家制度，作家由政府供养，作家干部身份定位明确，各种待遇由国家保障。可以说，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优越的文学制度和作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中国文学的繁荣。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作家队伍、文学作品

的绝对数量、文学期刊的种类都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这样的制度也有其局限性：其一，作家的干部身份决定了作家服从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必然性，而这恰恰与文学所要求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相违背；其二，过于严格的管理体制，对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都不得不体现国家意志，因而政治性成为中国文学挥之不去的标记；其三，作家的被供养客观上也造就了许多作家的官僚化，他们的创造性得不到有效的保证，有些作家多年不写作，并没有制约和惩罚机制；其四，庞大的作协机构和作家队伍占用了太多的国家资源，而作家管理机构的行政化与机关化也与文学的本质相去甚远；其五，出版和传播媒体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过多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自身适应市场、自我造血能力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既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又是反映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辉煌成就的见证。与此同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也是与新的形势下中央对文学组织、管理、生产、传播机制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不可分的。今天，在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历史经验的时候，对于文化和文学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文学体制改革在作家制度、期刊管理、出版社运作方式等方面的尝试，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体制外作家和体制内作家的不平衡问题、文学期刊的生存问题、新兴的文学样式的管理问题，等等。在今天，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十分重大，这表现在：

其一，中国新时期文学体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同步呼应

的，文学体制改革之于新时期文学发展经验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道路与线索。从文学体制角度讨论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在通常的政治经济线索、思想线索和现代化线索之外又提供了一个从精神和情感层面总结、理解新时期中国巨大发展成就的新视角。

其二，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社会改革的步伐加快，而文学和文化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总结，有助于调整今后文学体制改革的思路，制定新的文学发展战略。新的文学体制应做到既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形势的需要，又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其三，对文学制度各个层面的探讨，对文学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可以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强国战略以及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实证性的支持，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

鉴于此，我以《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了批准。我们主要想针对下述问题展开我们的研究思路：

1. 要对中国文学体制形成的复杂背景、历史现实意义以及独特功能有一个理性、客观、准确的评判与梳理。这存在很大的难度，与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管理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2. 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形成、完善与变革也有着阶段性的反复，在某些不同的时期，随着领导人的变化、政治事件的发生，对文学体制的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要弄清这里的来笼去脉，需要深入历史的现场，调阅大量的原始材料，更需对党史和政治史有全面的了解，从文学看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超越文学的疆界，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复合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国文学体制的根本问题。

3. 中国的文学体制，一方面针对文学的生产、创造，另一方面又针对文

学的传播、消费，而其背后最根本的就是对文学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中国的文学体制保证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保证了中国文学的繁荣，但同时也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文学的自由和独立性。如何正确认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根本触及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底线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4.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时代，中国的文学体制改革还刚刚起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许多新现象、新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现成的答案，如何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下推进文学体制的改革，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技巧。

5. 关于中国文学的体制，一直存在许多争论，比如政府应不应该养作家的的问题、各种作协机关是不是应该取消的问题、文学期刊是推向市场还是由政府包办的问题，都不是某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今天的文学体制改革显然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应该有明确的思路 and 对策。

应该说，这个课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难度很大。我们目前的研究也还处于一个初步阶段，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也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初步成果，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各方对这个话题的关注。

最后，要感谢黄发有、邵燕君、任美衡、文红霞、张丽军、孙桂荣、房伟、王秀涛等各位课题组的同仁，感谢大家付出的辛勤劳动。

吴义勤

目 录

前言 / 1

文学制度变革的背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轨迹与
价值观反思 / 1

当代文学制度的内在属性、历史变革和改革趋向 / 34

作家身份危机制度变革与文学新变 / 44

文学评奖机制改革与新时期文学 / 55

茅盾文学奖的“制度—美学” / 64

当代出版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 / 133

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 / 152

新时期期刊出版制度研究 / 168

目 录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场 / 180

文学传媒与当代文学生态 / 21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 / 252

网络时代：“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与“主流文学”
的重建 / 269

文学制度变革的背景：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轨迹与价值观反思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单纯的文学现象背后其实都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释。中国新时期文学自然也不违背这一规律，现在看来，它正是在一种既变幻又停滞、既封闭又开放、既纯粹又复杂的“合力”文化语境中诞生的特殊文学现象。而今天，当我们试图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文学史判断和价值定位时，对它存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梳理和挖掘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考察新时期文学与中国近二十年文化语境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同时又更需要有分析的眼光。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直线，它不单纯体现为时间关系，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关系。因此，我们对文化语境的剖析必然地也必须在时间层面和结构层面同时展开。从时间层面上看，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语境的变化必然地刺激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阶段性转型。从结构层面上说，处于新时期

文化语境结构核心的仍然是政治话语，其与经济、思想、文化虽然维系着一种互动的张力关系，但决定整个文化语境的形态与性质的仍然是政治。而正是基于对新时期文化语境的此种认识，我们在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关系时发现新时期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从一元到多元、从中心到边缘、从浮躁到放松的动态发展过程。本章的任务就是尝试性地揭示这个过程与文化语境的辩证关系。

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当然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但这种转折首先仍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站在 21 世纪的今天来回首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我们会发现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等。

↑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的共同的热情就是欢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一方面是控诉罪恶，一方面是欢庆新生，个人的声音已经彻底融入了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声浪，全中国此时实际上也就剩下了一种声音。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事实证明这种告别是很难的。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即使到了 1978 年秋天，邓小平已经官复原职 14 个月，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

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中心任务不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揭发猛批“四人帮”，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按照华国锋对7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10亿中国人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打一场人民战争’。”^①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伤痕文学”诞生的必然性，也完全能够宽容“伤痕文学”的艺术缺陷，因为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他们无暇顾及艺术问题，实际上他们此时也还没有能力顾及艺术问题。“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正是出于这种惯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登陆”。不管我们现在怎样评价伤痕文学，我觉得至少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其价值文学史是无法回避：这就是现实主义在中国虽然是一统天下的主潮，但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正是“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绝裂。

^①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0页。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经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惯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新的“个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暧昧不清。胡耀帮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开始了理论上的“文章救国”运动，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朦胧诗及反思文学可以说就是这种语境的直接产物。本质上，朦胧诗就是反思文学的先声，它传达出的“我不相信”的怀疑精神，与政治领域胡耀帮等人对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斗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之所以说反思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写作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如果说反思文学已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其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而对改革文学而言，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对于巨大时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未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

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改革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其在整个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掩盖改革文学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毕竟从整体上说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的写作，其旧的文学思维惯性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旨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在笔者看来，真正代表新时期文学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的是寻根文学。1984年前后兴起的寻根文学其直接的触发点是“拉美文学的爆炸”。几十年的文化封闭和文化禁锢，使中国作家普遍地有一种艺术的迟到感和文化失落感，面对以欧美大陆为中心的灿烂辉煌的20世纪世界文学，他们在茫然失措的同时，也油然而生重建中国文化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同处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适时地给了中国作家以启

发和某种代偿性的自信。拉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中国极其相似，拉美的文化之“根”远没有中国五千年文明那么“深长”，既然拉美作家可以在对文化之根寻找与挖掘中实现文学的辉煌，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和条件实现这种辉煌了。于是，一个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参照之下进行民族文化和历史反思的文学寻根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寻根文学的主体是一批具有较高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知青作家，虽说他们的理论难免有稚拙和混乱之处，但他们不满文学现状、立足文化批判和文学建构的自信和勇气则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寻根文学虽然在表面上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采取的是一种保守和后退的姿态，但一旦撕去笼罩在其上面的文化和思想反思的外衣，我们会发现寻根文学已与我们经验中的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相距甚远，其在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和进展丝毫不逊色于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寻根文学已经本质上结束了单一的写实主义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的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之类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这种突破概括地说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由写实转向写意可以看作是寻根文学最基本的写作策略。无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小说或飘逸或反讽或凝重或幽默的语言风格都给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其二，隐匿和虚化的文本结构方式。寻根小说已经摒弃了经典的整一结构方式，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空缺和空白。艺术线索也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传统小说的明晰和直白开始为模糊、歧义甚至晦涩所替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又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而后者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寻根小说之后,随着1985年之后新潮小说的崛起,中国新时期文学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阶段。所谓自觉写作,是指作家在拥有了对于文学本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于文学审美本性的建构冲动和主体能力之后的创造性写作活动。虽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文学至少必须表现出挣脱这种种纠缠的充分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新潮小说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自觉写作阶段。新潮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小说。我觉得,“形式主义”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得以提倡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双重反抗。正是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中国文学开始轻松自在地脱离现实和政治惯性的裹挟,回归其本体写作之路的。也正是在形式主义大旗下,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命题,比如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关系、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写实与虚构的问题、真实与想象的问题,等等,全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命运。当然,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新潮小说在确立中国新时期文学全新的思维认知和表达模式时,也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现实、历史、时代的关系,不自觉地割断了文学与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的传承关系,人为地制造了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天然鸿沟,这使新潮小说仿佛成了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来的花朵”,其营养不良、根基不深,也给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其后,20世纪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90年代初的新生代小说都可视为是对于新潮小说的自觉超越和艺术修补,均是自觉写作的代表。就前者而言,它既没有回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又很好地修复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后者而言,它既克服了新潮小说的现实失语症,又开始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尝试建立真正的个人话语。这些都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回归本体的革命历程。

二、从一元到多元：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但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还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①而此时，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如果说“五四”时颠覆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80年代所要反叛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当代社会随即被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老实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②这本书还具体地描述了

①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81页。

② 同上书，第1页。